

中国的日本道德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林子博 (LIN Zibo) *

本报告旨在对中国近十年来的日本道德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动态加以梳理,在此基础上,结合报告人自身的研究课题,对该领域今后的研究趋势和发展动向进行展望。

自 19 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道德教育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其间,从二战前立宪君主制政体下的“国民道德”,到战争期间的皇国民化教育,再到二战后在民主主义体制下以重视个人尊严和自由为前提的道德教育,这一路的历程可以说是作为近代国家的日本经历自我形成、毁灭和重生的写照。而战后日本对于本国道德教育的研究长期都是在备受争议的环境下展开的。这些争论大大超出了学术的范围,牵扯到政治界、教育界及一般民众对于战前的历史、战争本身、社会问题以及政府政策走向的强烈关怀。如何评价战前的道德教育及战后的教育改革?如何从道德教育的角度去思考解决校园暴力问题的对策?怎样去把握执政党推行的道德教育“教科书化”的意图和导向?这一系列问题和争议不仅反映出人们对与教育相关的现实问题的关心与忧虑,更牵涉到当代日本社会和国民对历史认识的分歧,以及对学校教育本质的困惑和追问。

在中国,围绕日本的道德教育开展的学术研究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以来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仅涵盖了对日本道德教育理念和政策的介绍和考察,对现代化进程中道德教育所扮演角色的分析,还包括了许多中日道德教育的比较研究。然而,这些研究是基于何种问题意识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中国学者所关注的焦点和论调有哪些特点和局限?如何在继承这些成果的同时,突破当下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本报告将尝试对上述问题提出个人的见解并激发起更多建设性的讨论。

一、中国的日本道德教育研究的现状——对近十年研究动向的回顾与梳理

(一) 问题意识

纵观国内对日本道德教育的各类研究,不难发现其中流淌着一项基本共通的问题意识。一言以蔽之,就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探究同属东亚儒教文化圈的现代化邻国日本在发展道德教育方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来为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教育课题提供借鉴和参考。

例如,国内长年从事日本道德教育研究的专家饶从满在其 2010 年出版的专著《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中就曾明确指出,“通过对与中国拥有相近历史和文化背景,且已走完追赶型现代化历程的国家——日本的道德教育与现代化关系进行集中和深入的研究,也许会达到更为完美的以他山之石攻玉的目的。”¹当然,正如下文即将提到的,这里的借鉴不仅包括了正面学习,也包含了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加以批判的意味。此外,还有许多探讨战后日本学校德育的论文也抱有类似的问题意识,即希望通过对日本道德教育课程建设方面的经验或德育教科书的考察,获得有益于中国中小学校德育工作开展的启示。²

* 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

¹ 饶从满:《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页。

² 比如朱伟文:《日本学校德育实施方式对我国的启示》,《高等农业教育》2011年第11期;卜庆刚、柳海民:《日本小学道德教科书(东京版)《充实的心灵》的静态分析》,《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11期,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研究还将日本的公民道德教育或大学里开展的各项教育活动与颇具中国特色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接,希冀借鉴日本的经验促进当下中国思政教育事业的发展,解决社会转型期经济发展与公民素质相对滞后的矛盾。³

(二) 基本论调

从借鉴日本经验这一原点出发的中国国内研究根据各自对道德教育的聚焦点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大致形成了两类基本的论调。其中一类认为在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和谐社会秩序的背后,道德教育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支撑作用。这类研究多聚焦战后的德育改革,大体上倾向于对其采取肯定评价。例如,谷峪在2005年发表的《日本小学现行《道德》教科书述评》一文中所做的如下阐述就集中体现了这样的问题意识。“战后日本在短时期内迅速成为经济大国,与其有‘日本精神’的国民息息相关”,而“这样高素质的国民的形成,当然得益于高效益的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在日本教育中的地位一直都是不可忽视的,在这方面那种扎实有效的做法更加值得我们借鉴。”⁴

另一类论调则是侧重于对日本道德教育中的国家主义传统和政治化倾向的批判。例如,对当代中日道德教育进行比较研究的王丽荣曾指出,“日本的爱国教育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既与振兴民族、富国强兵思想相关联,另一方面更显示出其强烈的军国主义侵略性特征。”⁵对于当代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开展过专项研究的曹能秀也指出,虽然二战后的道德教育是在对“教育勅语”和修身科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展开的,“但仍存在严重的政治化倾向;这既是因为对战前的“教育勅语”和修身科的批判只停留在关心政治的视角上,没有上升到关心道德教育理论的视角,又是因为近代以来日本道德教育对政治的依附性。”⁶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评价,饶从满对道德教育在日本现代化历史中的功过做了如下评价,基本代表了目前中国国内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主流见解。即在肯定日本道德教育培养的集团主义意识和立身出世主义意识为经济现代化发展提供巨大支持的同时,又对其从明治时代以来形成的政治主义和国家主义特征在后期的膨胀和荼毒加以批判,并指出“正是由于日本的道德教育中达成目标和特殊主义忠诚凌驾于其他普遍伦理原则如博爱、平等、自由之上,才会导致日本后来的发展结果。”⁷

(三) 考察的局限性

通过以上对国内研究状况的综述,不难发现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问题意识的牵引下,中国学界对于战后日本道德教育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积累。相形之下,对战前的修身教育的历史嬗变则缺乏足够的关注,实证性研究更是少之又少。正如饶从满所指出的,在从正反两方面思考当代日本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时,“只关注战后道德教育上的表面问题是不够的,还必须认识到继续存在于战后道德教育中的政治主义、工具主义的特征。”⁸

然而,虽然国内学界已经对日本道德教育中存在的上述问题予以批判,且认识到这些问题肇始于明治时代的修身教育传统,但所谓政治化倾向、国家主义特征和爱国主义教育这类

等等。

³ 如李祖超:《发达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途径比较分析》,《中国高教研究》2006年第12期;孙淑秋、宋玉忠:《日本和韩国公民道德教育的相似性及其启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年第3期。

⁴ 谷峪:《日本小学现行《道德》教科书述评》,《外国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第44页。

⁵ 王丽荣:《中日爱国主义教育思想的比较思考》,《比较教育研究》2005年第8期,第34页。

⁶ 曹能秀、王凌:《论战后日本道德教育的工具化倾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8卷第3期,第40-41页。

⁷ 饶从满:《日本现代化进程中的道德教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3-415页。

⁸ 同上,第415页。

概念的历史内涵究竟为何？既然说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在道德教育中凸显的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是从明治时代的国家主义发展而来的，那么后者在流变发展的过程中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当时存在过哪些不同的思潮和反抗的声音？又是什么力量导致了道德教育中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性格的最终成型？如果我们能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思考，那么道德教育中的国家主义传统就不再只是静态的标签和固有的结果，而将转化为流动的思想和可供解构的过程，来帮助我们更好地借鉴“日本”这一他者的经验来思考中国。然而就报告者管见，基于一手资料，对上述思想的流变加以动态考察的实证研究目前尚不多见。

同样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上述局限不仅存在于中国的日本道德教育研究中，日本的学者针对本国学界的现状在近年也提出过类似问题。贝塚茂树就曾指出，战后日本国内的道德教育研究出于对战前教育的“断罪”，而忽视了对后者的历史进行学术上的反思，因此动辄陷入政治上意识形态对立的怪圈。⁹ 森田尚人也表示，在对待道德教育的问题上，对历史置若罔闻的意识形态论调及其所带来的“思考停止”现象至今在教育界和学术界仍然比比皆是。¹⁰ 可见，将国家主义和政治主义等标签概念的有效性相对化，重回战前道德教育的现场，重新把握日本现代道德教育的原点和德育思想的流变是中日两国学界共同面对的课题。

二、东亚道德教育史研究的展望——以报告者自身的研究课题为例

（一）以论争史的手法重构明治日本的道德教育史

在处理上述课题时不得不提到的是长期以来在学界处于支配地位的，以教育勅语为核心的历史认识框架。¹¹ 这是由于鼓吹忠君爱国的教育勅语作为国民道德的基本纲领在战前扮演了动员国民走上战场，为国捐躯=为天皇牺牲的强大意识形态功能，战前的日本道德教育系统被打上教育勅语的烙印被作为反动的遗产遭到学界的冷落和教育界的反感。正如日本教育学者松下良平曾指出的，关于学校内道德教育本质的追问在战前被教育勅语封印，在战后则同教育勅语一道被打入冷宫。¹² 换句话说，这一认识框架阻碍了我们真正进入战前道德教育的现场去考察被放逐在“教育勅语体制”之外的德育思潮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

针对这一问题，报告者近年的研究从历史学的视角切入，回溯到教育勅语颁布的前夜，以森有礼文政期（指森有礼于 1885 年 12 月至 1889 年 2 月担任首任文部大臣，对国民教育制度进行全方位改革的时期）为中心，对森有礼及其部下同福泽谕吉、加藤弘之、西村茂树等思想家，围绕道德教育的理念所展开的论争关系及当时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与嬗变加以考察。研究的基本框架是以文部省面向师范学校和中学编纂的德育教科书《伦理书》为主线，考察编纂的背景、编纂组成员的人事变动、编纂和改版过程中引发的争议及其姐妹篇《布氏道德学》（被森有礼选定作为与《伦理书》配套的低年级教科书）在教育勅语颁布后受到的批判。本研究没有像以往的研究那样通过聚焦森有礼个人德育思想的形成去概括森文政期德育改革的意图和特色，而是采取论争史的手法，以实证手段还原同时代不同德育主张之间的互动，从中探究言论产生的背景与意图、指向及影响，尤其是将《伦理书》编纂组成员的言论

⁹ 贝塚茂树监修『文献資料集成 日本道德教育論争史』（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15 年）。

¹⁰ 森田尚人「歴史の中の論争を通して道德教育の本質に迫る」，貝塚茂樹監修『文献資料集成 日本道德教育論争史』（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15 年）。

¹¹ 教育勅语乃是 1890 年 10 月以明治天皇名义透过文部大臣发布的，指示日本教育方针的诏书，宣称皇室的祖先确立了“臣民”的道德，把“臣民”团结一致实践忠孝道德规定为“国体的精华”和“教育的渊源”。直到 1948 年国会决议宣告其被废除为止，它一直被作为日本帝国教育的根本规范。

¹² 松下良平「岐路に立つ道德教育—グローバル化がもたらす悲劇と希望—」，『教育と医学』第 61 号（2003 年）。

活动放在当时甚嚣尘上的“德育论争”的脉络中加以分析和定位。与此同时，再通过对《伦理书》和《布氏道德学》等教科书的文本进行解读，揭示出文本中有关心理学和伦理学的抽象概念表述背后所折射出的论争关系及编纂方意图传达的德育理念。

这一研究发现，森有礼等人的德育构想不仅具有前人研究中所指出的反抗传统儒教的性质，还与同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人的德育构想大相径庭。与福泽等人主张通过宗教等手段对国民的道德行为进行情感操作的想法不同，森有礼等人在德育引入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伦理学，强调必须依靠理性和判断力对情感（包括忠孝之情）的狂热化所带来的负面行为加以压制，更进一步主张对于只顾本国私利而罔顾人类福祉的爱国心加以限制。本研究通过将森有礼主导编纂的教科书文本结合德育论争的历史脉络加以分析，使这些构想和意图浮出水面，从而揭示了教育敕语之外另一条发展近代道德教育的可能性。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报告者将把考察的时间范畴向后延伸至教育敕语颁布（1890年）以后的20世纪最后十年，对国定教科书时代以前，“教育敕语体制”尚未稳固确立时期的道德教育论争进行梳理。希望通过用论争史的手法重构明治日本的道德教育史，挖掘并思考那些在一场场思想交锋中呈现出的道德教育的课题及其现实意义¹³。

（二）跨越国境的“修身”和“伦理”——近代中国对日本德育思想的接纳与转化

在进行上述研究的同时，报告者还考虑将日本与近代中国在德育思想交流上的互动纳入视野。近年已经有中国国内学者聚焦蔡元培所著的《中学修身教科书》（1907年出版）与井上哲次郎等人编著的《新编伦理教科书》（1897年出版）及《中学修身教科书》（1902年出版）之间的内在关联，并指出蔡元培对井上等人的著述有所借鉴。¹⁴事实上，除了曾为日本德育教科书的中文译本《中等伦理讲话》（元良勇次郎煮、麦鼎华译）写序推荐外，蔡元培还参照日译本将德国哲学家菲利普·泡尔生（Friedrich Paulsen, 1846-1909）所著《伦理学原理》译为中文。¹⁵这表明，中国早在清末年间就已经在道德教育领域开始了对日本经验的借鉴，而在借鉴的过程中日本并非唯一的他者，西方伦理学成为了中日两国在构建本国道德教育内容时共同参考的坐标。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中国通过日本这一媒介接纳了西方这一共同的他者。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该追问的或许是如下一些问题。当时的中日两国在国民的道德教育领域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是什么？在借鉴西方伦理学回应本国的德育问题时分别处在怎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两国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根据这些背景和脉络对西方的学说进行了哪些取舍？在这一借鉴的过程中在中日两国之间又发生了哪些单向或双向的交涉？它们对于我们思考今天的东亚社会道德教育的走向有哪些现实意义？从明治日本的道德教育论争史的立场出发考察近代中日道德教育思想的互动并思考上述问题，将是报告者未来的研究方向。

¹³ 2015年1月，由贝塚茂树监修的《文献资料集成 日本道德教育论争史》第III期（完结）由日本图书中心出版社出版，包括原教育史学会代表理事森川辉纪、原教育哲学学会代表理事森田尚人、道德教育研究的专家松田良平和押谷由夫在内的著名学者联名推荐。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通过论争史的手法重构道德教育史并以此探求道德教育未来出路的问题意识已经引起了日本教育学界的共鸣。

¹⁴ 龚颖：《蔡元培与井上哲次郎“本务论”思想比较研究——兼论中国近代义务论形成初期的相关问题》，《中国哲学史》2015年第1期。

¹⁵ 同上，第124、115页。